



动荡时代：本是同根生， 相煎历来急



周六晚上，女儿从曼哈顿打电话来，问俄乌战争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。她过去从未谈到过这类话题。放下电话，不寒而栗：20多岁，正享受青春年华，竟然要去担心这样沉重、恐怖的可能前景！那不是马斯克和霍金们的预言吗？

虽然过去二三年来，笔者多次说过，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二战和冷战结束以来最动荡和最危险的时代，但那只不过是自己的感觉和判断。现在，一想到我们的后辈可能要面临一场战火，而且也许是核战争，郁闷之情难以言表，夜不能寐。

关于乌克兰战争起因的说法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曾经的核心问题是这场战争是否可以避免、如何避免。在这方面，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 Jack Matlock 的说法有其合理之处：可以避免，但没有避免。

时过境迁，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和如何能尽快鸣金收兵，料理后事，还是扩大、升级？战争与其他事物差不多，一旦启动往往会有自己的“逻辑”和“生命力”，充满各种偶然性。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。

笔者离开学术界已经多年，却发现当年学习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“十八般兵器”竟然都可以被人信手拈来，套用发挥。更觉恐怖的是，各国的一些名家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在大谈这场战争的“必要性”“正义性”和如何打“赢”，鸡血味甚浓。“莫谓书生空议论，头颅掷处血斑斑”？他们是投笔从戎，以身报“国”，还只是网上谈兵，过一把铁血之瘾？反正赌的不是自己和家人们的项上宝物、身家性命。

二周前，以“历史终极说”扬名的美国学者福山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上发表文章，主张重新启动历史，建立“自由主义的世界新次序”。“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”？这是一个尚未被完全证实的命题。建立世界新次序的风险、胜算与成本如何？不知所云。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Haass 一日数“推”，鼓吹各种抗俄策略。运用“边缘政策” (brinkmanship)？还是风险、成本和效益说不清楚。一旦失算或失控，从悬崖边缘跌落深渊的可能是整个世界。“斩首”、政变和政权更迭，“因为俄罗斯是一座千疮百孔的破房子，内外交困，熬不过几周或几个月”？二战初期某人对苏联也有此说，只是阳差阴错，没有兑现而已。更何况没有人可以预测过程、风险和结果。

在各种媒体的疲劳轰炸下，笔者不由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游学时的几段经历。

1982 年，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过布热津斯基教授的一门让人终身受益的课：“美国国家安全策略”。每堂课一个半小时左右，谈关于美国当时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应付这些挑战的各种选项。高屋建瓴，清晰犀利，没有半句废话或空话。有些专题（如裁军和非洲政策）由行业专家们客串。出生波兰的布热津斯基批评苏联的立场毫不含糊。但是，在大内中枢拿捏运作过的他，从未幻想过美国可以在苏联实施政权迭更 (regime change)：胜算、风险与成本均无法估算和控制。涉及到美国的具体战略问题和策略选项时，他强调策略与现实、承诺与能力、成本与效益三者必须相符。

彼时冷战和围堵多年，避免两大核霸权之间的直接热战或核战却始终是战略底线。“我们必须考虑到苏联的制度、决策机制和动因与我们完全不同”，几年后，他对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笔者如是说。

当时上的另一门课是日本问题专家 James Morley 教授的当代东亚国际关系。谦谦君子的他二战时曾热血从军，在美国海军情报部参与破解日军密码。讲解日本参与二战时，他介绍了美国对日本实行制裁禁运与珍珠港事件之间的关系：当时，多数美国选民对在亚洲和欧洲打得热火朝天的战争兴趣索然，靠选票吃饭的罗斯福总统只能根据民意行事，高挂免战牌，同时通过“租借法案”向英国、苏联、中国提供各种援助，而日本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导致其铤而走险。一位学生问道：“难道罗斯福对日本的制裁与禁运是为了逼迫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”？Morley 教授的回答是：没有证据证明他有那样的“阴谋”或“阳谋”，毕竟 3000 多名美国海军牺牲了。但是，遭袭后全美国同仇敌忾却是总统下令全面参战的民意基础。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“中途岛”等好莱坞大片中有相关的描述。

1983 年，笔者转学到普林斯顿大学。在那里上的几门课记忆犹新：Stephen Cohen 讲苏联内政外交，Robert Gilpin 讲国际关系理论，Richard Falk 讲世界次序 (World Order)。Cohen 教授的成名之作是关于斯大林的传记，当年不过 30 来岁，已是美国著名的少壮派苏联问题专家。在苏联待过几年，并且每年要往返几趟，他俄语流利，思路极其敏捷，谈起苏联的内政外交如数家珍，很像笔者遇到过的一些汉学家们聊中国。对

耶错耶，笔者无从判断，因为自己对苏联不甚了了。Cohen 教授深受学生们欢迎，也常为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出谋划策。

但是，几年后的历史巨变却令所有美国政府和学界的专家们瞠目结舌：1989 年柏林墙轰然倒塌，1991 年苏联骤然解体和冷战悄然结束，旧世纪的最后一天普京接班上任，等等，等等。“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和资源，原来我们既不了解那个国家，也没有‘打赢’冷战：它是自己解体的”，一位熟悉的华盛顿的著名“玩家”后来深感晦气地对笔者说。

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流派。但是，现实主义（realism）和理想主义（idealism）是分门别类的基础。

Gilpin（笔者的指导教授之一）毕业于自由派大本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，却是普林斯顿校园中不多的共和党人。从修昔底德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开始讲国际关系理论，他坚信现实主义，认为决定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利益，而不是各种主义、文明或意识形态；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是民族国家（nation-state），而不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或势力；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国家之间你争我夺为常态，互通有无属自然，拉帮结派也无可厚议。和平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隔，反之亦然。“春秋无义战”与合纵连横？只是到了核子时代，因为战略均势与威慑的风险与成本远高于过去，所以“局部”“有限”“常规”和“可控”等几个关键概念的定义与内涵也完全不同。Gilpin 治学严谨，讲经论道，与“世”无争，不为政府谋划。彼时正值冷战高峰，他也时常在课堂上从理论的角度讲解里

根的对苏策略。

教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 Falk 出身耶鲁和哈佛大学，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积极参与了反越战和民权运动，也曾经在一些国际组织运作、挂职。他崇尚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、自由主义和超国家的世界次序。在他看来，整个世界应该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主义之上的次序。这个国际主义的次序或机制应该超越民族国家的利益。虽然相信“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”，却认为应该由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制约，甚至干预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活动和外交政策。如何定义、协调和制约各国的不同，甚至尖锐冲突和对抗的利益或矛盾？语焉不详。这也是理想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命门之一。多年来，他尖锐批评美国各届政府的许多对外政策（包括越战和伊拉克战争）。犹太籍的他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，并且支持霍梅尼“伊斯兰革命”。奥巴马当政期间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Susan Rice 要求联合国撤销 Falk 在人权观察组织中的职务。

美国大学的校园就是那样生气勃勃、缤纷五彩，而且这些立场、观点完全不同的教授们没有割袍断义或划地绝交，倒是常常在网球场上切磋对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9608

